

公共博物館在中國的第一個百年 (1829-1929)

時 間：111 年 6 月 8 日（三）15:00-17:00

地 點：線上直播

主 講 人：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兼與談人：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記錄，並由戴麗娟研究員審訂。

作為皇家學會創始成員之一的伊萊亞斯·阿什莫爾爵士（Elias Ashmole, 1617-1692）於 1677 年時將部分收藏品捐贈牛津大學，條件是蓋一棟樓作為展示地並對外開放，此即 1683 年成立的阿什莫林藝術與考古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座公眾博物館（Public Museum）。中國則以清末狀元、實業家暨教育家張謇（1853-1926）於光緒三十年（1905）創立的南通博物苑，視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座由中國人獨立創辦的公共博物館，並於 2005 年時舉辦了盛大的「百年紀念活動」，此舉即是將中國博物館的發展定錨於 1905 年。



圖一：講座合影（左起）：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與談人蔣竹山副教授、主講人戴麗娟研究員、中央大學歷史所皮國立副教授、中央大學藝術所巫佩蓉副教授

事實上，在此之前中國各地猶有數個早期博物館的存在，但因創立與主事者皆為在華洋人，故被視為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論者通常認為這些早期博物館專屬洋人觀看，對當地華人沒有影響，因而產生不值得注意的論調，但事實上遠非如此。本次講座邀請中研院史語所戴麗娟研究員兼副所長，從歷史脈絡重新耙梳這些早期博物館成立、發展與轉變過程，吾人也得以重新瞭解其歷史意義。

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的博物館為澳門不列顛博物館。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於1829年3月2日頭版刊載一篇報導，文中先說明「在華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 in China)即將成立，並附有一份宣傳單回溯此前狀況，最後是報導者講述的後續發展。宣傳單指出有人提議在廣州或澳門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持「自然史與藝術奇珍品陳列室」的設置，而目的乃為收集中國及鄰近地區自然史標本與工藝珍品，促進眾人對當地的認識，並藉由展示讓當地中國人瞭解外國人對這方面研究的興趣及用心，以及條列希望收到的各項藏品。宣傳單也說明了在澳門成立博物館可能會遭遇生物標本保存不易的困難¹，但若是位於印度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都能在更困難的條件下存在多年，澳門理當也可以克服。報導人則提到在同年2月22日已舉行草創會議，決定將博物館設立於澳門，同時已收到不少藏品，並稱馬禮遜博士(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會將宣傳單譯為中文，發散給廣州行商或至廣州洽公的內地商人，期待能使中外人士共襄盛舉，將相關藏品捐予該館。主講人戴麗娟研究員指出，在時序上成立於1829年的「在華不列顛博物館」，很可能即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此篇報導雖未署名，但應是出自文中談及的馬禮遜²之筆，又據馬禮遜回憶錄所載書信，其對於該館草創諸事知之甚詳，很可能也是此館的主要推動與宣傳者。

不過這座博物館僅存在五年，所留下的直接史料極少，僅能從零星紀錄中得到一些線索。例如來自美國麻州的女性羅哈蕊(Harriett Low, 1809-1877)曾於1829至1833年於澳門定居，期間她時常寫信給家鄉親人，留下頗詳細的生活日記，因而成為後世瞭解澳門洋人社群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例如1829年12月12日，時任廣州商館助理醫生的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1797-1879)來訪，羅哈蕊欲贈予鳳梨纖維製成的布料，這位醫生則建議將這種特殊的布料捐給博物館，可見在博物館創立初期鼓吹各界捐贈藏品，當地英美人士日

¹ 此處應指過於潮溼。

² 馬禮遜博士(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為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也擔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翻譯，同時是《廣州記事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常言談也會提及此事。此外，1831 年 7 月 5 日羅哈蕊在瓦契爾住處看到從雅加達寄來的一批準備放在博物館的鳥類標本。1832 年 2 月 1 日羅哈蕊記錄參觀博物館時看到人類骨骼標本，並說此館成立時間雖短，但已經擁有許多罕見的展品。1833 年，越南名臣李文馥 (Lý Văn Phức, 1785- 約 1849) 因護送海上迷途的清朝官員返華，亦曾在廣州友人陪同下參觀過這座博物館，還寫下〈登洋人博物樓〉詩，於注文中云：「西洋人最機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骨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亦合於羅哈蕊所見。英國醫師兼自然史學者貝內特 (George Bennett, 1804-1893) 在 1832 到 1834 年間展開太平洋地區的長途旅行，回程後出版了於太平洋各國的見聞遊記，其中就提到這座澳門博物館即將於 1834 年關閉的情況。

從這些零星資料可知，這個早期博物館是開放給當地眾人參觀，連越南外交官也走訪過。其展品也並非僅有中國產物，而是世界各地來的物件。

以發現大熊貓、以及將大麋鹿 (別稱四不像，西方也稱之為大衛神父鹿) 引入歐洲而著稱於世的法國遣使會神父譚衛道 (Armand David, 1826-1900)，曾於北京蠶池口北堂設立標本陳列室³，據樊國梁主教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 的《燕京開教略》所記，指譚衛道：「抵華後。遍遊名山大川，收聚各種花卉鳥獸等物。以備格致。即於北堂創設博物館一所。內儲奇禽計八百餘種。蟲豸蛺蝶。計三千餘種。異獸若干種。植物金石之類。不計其數。」文中並未具體指明該博物館成立於何時，但目前一些線索可推知是 1866 年到 1868 年



圖二：《燕京開教略》插圖 (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³ 此設置的中外文名稱皆不確定。

間設置。上文提及當時此設置吸引王公貴族參觀，連慈禧太后也曾微服參訪過。事實上，1885年因慈禧太后擴建宮室，決定將蠶池口教堂占地收回，協議中還指定陳列室內的標本和教堂的管風琴都一併贈與給皇室。

另外《教會新報》(*Church News*)、《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的主辦人，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1836-1907)曾於1875年在《萬國公報》362期刊載了一篇〈書申報創設博物院後〉，提到自己曾到北京這座博物館參觀的經驗，其云：「搜羅直隸、蒙古、滿州，以及山西、陝西并泰西各處奇禽異獸，大而獅子、小而燕雀，無一不備，即螳螂、蚱蜢等物亦列其中。死者如生、枯者轉榮，居然有活潑潑之機焉。」也為這座博物館留下鮮明的參觀見證。

其後則是1868年創立於上海的徐家匯博物院，其源起與當時法國耶穌會江南宗座代牧朗懷仁(Adrien Languillat, 1808-1878)於1872年所設立的「江南科學委員會」的規劃有關。這個委員會初分為四個小組，包含負責氣象觀測臺與科學出版、自然史研究的博物館、前輩在華傳教士所留下中國歷史與地理的研究，以及包含傳教與科學兩類中文出版品籌備材料等。博物館事務負責人為韓伯祿神父(Pierre Marie Heude, 1836-1902)。因各種條件不同，此四個項目各自發展皆有所差異，博物館的建築物遲至1883年才得以完成。儘管如此，博物館事業的後繼者為感念韓神父的貢獻，仍將博物館的歷史上溯至其來華的1868年。事實上，韓伯祿於博物院草創階段於標本廣泛收集、整理、研究、發表的建樹確實功不可沒，其先以江南為主要範圍，進行了十多趟採集之旅；其後更將足跡遍及安南、暹羅、馬來西亞、雅加達、麻六甲、滿洲、韓國、日本，甚至西伯利亞東部等地的動植物標本。憑藉著這些努力，他從1874-1885年間陸續於法國出版十餘冊《中國中部與南京地區河產介殼類》⁴，後更將之集結成一部圖文並茂的巨冊著作。書中他一共描寫了一百八十九種介殼類，其中約有一百五十種屬未被發現的新種。1880年代中期開始，韓伯祿轉為以哺乳類動物標本收集為主，並陸續將整理結果發表於新設的出版品《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⁵中。

除韓神父的貢獻外，此博物館仍有賴其他神父的協助整理及擴充收藏。其中具備醫學訓練的蔣其儀(Charles Rathouis, 1834-1890)除了幫忙管理博物院標本、製作出版時所需之標本圖版，還訓練土山灣孤兒院⁶之青少年學習科學繪畫

⁴ 外文原名：*Conchyliologie fluviatile de la province de Nanking et de la Chine centrale*。

⁵ 外文原名：*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

⁶ 土山灣孤兒院最初稱為土山灣育嬰堂，乃是耶穌會為收留因災荒、兵禍而父母雙亡的年幼兒童所設立的機構，源頭可溯至1849年。

之技法。為使逐漸長大的孤兒們有一技之長，並減輕院方經費負擔，院內神父除基礎教育外，另設有工藝作場訓練各種技藝，例如雕刻、繪畫、皮作、木作、印刷、照相等等。其中以印刷、繪圖工藝場最為人注目，如《中華帝國自然史論集》的繪圖、刻版與印刷即出自土山灣孤兒院的神父與學徒青年之手。主講人戴研究員指出，在照相設備、彩色印刷技術未成熟前，動植物圖譜一類作品在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土山灣孤兒之技藝的成就卻鮮少為人所知。1930 年，徐家匯博物院遷入震旦大學內，改稱為「震旦博物院」，並與大學教育結合，與當地學界多所交流，同時透過對一般大眾開放參觀，逐漸展開科普活動，在 1939 年所舉辦七十週年慶祝活動中，有兩週開放一般民眾免費參觀，便吸引了七萬多人前來。

一樣位於上海的還有亞洲文會博物院，屬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⁷的附屬機構。此學會成立的宗旨於第一任會長、也是首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的成立開幕致詞中已指出。然而，因諸多因素，此學會遲至 1871 年秋才建成兩層樓的會所，其中二樓的兩個房間便作為圖書館及博物館使用。據最初幾任名譽院長的說法，博物院遲未成立的因素，除無適合的場地外，另一原因是缺乏適當的管理人，尤其是動物標本製作師。前所述及的法國遣使會神父譚衛道，在華期間曾訓練一位標本製作師王樹衡，其在譚神父於 1874 年離華後，被介紹到亞洲文會，至此博物院才開始正式運作，因此後來對於這個學會博物館的歷史大多以 1874 年作為創始年。

不過此博物館初期一直面臨標本管理人員欠缺的問題。1907 年初，海關官員兼亞洲鳥類專家拉圖許 (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1861-1935) 加入文會，也將先前於福州工作結識的田野捕獵助手唐啟旺 (1870-1932) 及兄弟推薦入館，此舉解決了此博物館的問題，也意外開啟了唐氏五代男丁在中國各博物館、生物科系擔任動物標本剝製師的傳統。在拉圖許之後，主講人提到另一關鍵人物是 1927 年成為正式院長的蘇柯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885-1945)，他不僅拆除重建、擴大會館，於 1933 年重新開幕，更使用帶有動物棲地背景的展示櫃，其中最引人注目者當是大熊貓的展櫃。此舉也讓館方得以透過展示來加強生態教育，如蘇柯仁本人便多次以當地中西學校學生為對象，進行系列演講。據主講人從學會年度報告統計，此館重新開幕後每月有上千人前往參觀，1936 至 1937 年人數逼近兩萬五千人，1939 年紀錄是四萬五千人，1940 年有六萬五千人參觀，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⁷ 外文原名：*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圖三：亞洲文會大樓於1933年落成

主講人戴研究員最後談到晚清報刊內有關博物館（院）的報導為數不少，出使海外的使臣遊記亦不乏參觀當地博物館的紀錄；民間人士當以王韜（1828-1897）的《漫遊隨錄》最為知名，包含香港、愛丁堡、倫敦、巴黎等地參訪博物館的描述；維新派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亦有開設博物館的建言，顯示當時有識之士已留意博物院的教育意義。前述之張謇南通博物苑，也是因建議清廷官方設立未果，才會決定在家鄉南通試辦，其作為「第一」之定位源於1956年，由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1898-1958）的認定，多少帶有點民族主義的論調。然而此前由外籍人士所設立、經營的博物館，對於中國當地自然史的基礎知識和興趣的啟發，仍有相當程度的貢獻，理當重新認可其歷史定位。